

敦煌所见经巾的形制、用途与实物

王惠民

(敦煌研究院 考古研究所, 甘肃 兰州 736200)

内容摘要 敦煌文献有若干信徒向寺院施舍“经巾”的记载,一些佛寺财产登记簿中也有“经巾”一物。有学者认为经巾“其形制与用途不明”,有学者认为经巾就是经帙。通过对敦煌文献的研读,可知经巾是阅读、念诵佛经时铺陈在经案上的一种织物,当“金经罢启,玉轴还终”时起到保护佛经的作用。本文对经巾的尺寸、质地、作用等问题进行了考察,并试图从藏经洞出土的丝织品中比定出经巾实物。

关键词 经巾;供养具;佛教文化

中图分类号 J520.9;K87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4106(2012)03-0001-06

The Shapes, Function, and Relics of *Jingjin* Found at Dunhuang

WANG Huimin

(Archaeology Institute, Dunhuang Academy, Lanzhou, Gansu 736200)

Abstract : Records referring to *jingjin* being donated to Buddhist temples were found in some Dunhuang documents, and *jingjin* was also listed in the account books of some temples. Some scholars think that the shapes and usage of *jingjin* are not understood, and others think that *jingjin* corresponds to *jingzhi*, a textile cover for scriptures. A study of Dunhuang documents suggests that *jingjin* is a kind of textile used to cover the desk before reading or reciting Buddhist scriptures and to protect the scriptures. This paper is a study on the size, materials, and function of *jingjin* as well as an attempt to identify the relics from the textiles excavated in the Library Cave.

Keywords : *Jingjin*; worshiping attributes; Buddhist culture

“经巾”在佛教典籍上记载甚少,法国学者侯锦郎认为敦煌文献中的经巾就是经帙,上海辞书出版社 1998 年出版的《敦煌学大辞典》第 595 页“经巾”

条云经巾“其形制与用途不明”,但敦煌文献中有若干关于经巾的资料,可考知经巾并非经帙,它的形制与用途也可考知一二。

收稿日期 2011-05-22

作者简介 王惠民(1961—),浙江省杭州市人,敦煌研究院研究员,从事敦煌学研究。

一 基本资料

S. 2687 包括 2 件文书, S. 2687(1)全文是:“弟子河西归义军节度瓜沙等州管内营田观察处置押蕃落等使特进检校太傅谯郡开国侯食邑一千户曹元忠浚阳郡夫人翟氏,先奉为国安人泰,万方伏款于台庭,社稷恒昌,四远来宾于王化。狼烟息焰,千门快乐而延祥,塞虏无喧,万户获逢于喜庆。府主宠禄,膺五岳而长隆,寿比王乔,等五星而永曜。合宅姻眷,俱沐祯祥,内外枝罗,俱沾福佑。己躬康吉,贤圣护持。法界有情,皆成妙果。敬造万(五)色锦绣经巾一条,施入宕泉窟,永充共(供)养。于时大汉天福十三年丁未岁十一月壬子朔十九日庚午毕功纪。”按:丁未岁是天福十二年(947),而非十三年,敦煌干支纪年与中原年号常有差一年者。这份卷子字体幼稚,可能是学生抄写本,所以有些错别字,如“万色”,据后文提及的 S. 2687(2)、S. 3565(2)等文书,可知应该是“五色”。五色,在其他佛教文献也多见,如《国清百录》卷 2 提到仁寿元年(601)皇太子杨广送天台山物品有:“杨广和南。僧使灌顶等所领,今施物目。仁寿元年十二月十七日白。石香炉一具(并香合三枚)、大铜钟一口、鸡纳袈裟一领、鸡纳褊袒二领、四十九尺幡七口、黄绫裙一腰、毡二百领、丝布祇支二领、小幡一百口、和香二合、胡桃一笼、衣物三百段、奈面一合、石盐一合、酥六瓶。”

S. 2687(2)全文是:“归义军节度使检校太师兼中书令敦煌王曹公之凉国夫人浚阳翟氏,敬造五色锦绣经巾一,施入窟内。伏愿一州土地,万里山河(河),烽烟不起于三边,乐业永安于万姓。皇后天年永久,四海河(荷)霖霖之恩波,大王神算遐长,七郡布殊常之德化。夫人心愿,愿王业金枝,衞佑窠寮,宫苑侍女,并皆安乐。百机周星,俱是菩提,含灵齐登觉路。于时大汉乾德二年甲子岁四月廿二日题记之耳。”按:乾德二年甲子岁为 964 年,乾德为北宋年号,此“大汉”或是抄写者袭用前件文书之误。本篇也没有标题,但内容与上篇完全相同,也是施一条经巾至莫高窟,《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没有定名。简单一点,可将这件文书定名为《乾德二年浚阳郡夫人翟氏施舍经巾功德疏》。将 2 件相差 17 年的《施舍疏》抄写在一起,大约是僧人或寺院学生的过录,而不是《施舍疏》原件。

这 2 份文书没有标题,几乎一家一定名。黄征

等《敦煌愿文集》第 376 页将 S. 2687(1)、S. 2687(2)均定名为《舍施发愿文》,参考 P. 3770 有佛事范文数种,第 4 篇标题是《舍施发愿文》,内容与本篇接近,此定名有一定的道理,但过于简略,无法与其他同类文书区别,何况《发愿文》与《施舍功德疏》是有区别的,此定名学界多不取^[1]。又《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完全相同)将 S. 2687 定名为《天福十三年浚阳郡夫人翟氏布施疏》(此书对第二件没有定名,似乎当成一篇看待,误),也是没有问题的。既然文中所述之事是“敬造万(五)色锦绣经巾一条,施入宕泉窟”,那么可称这份文献为《天福十三年浚阳郡夫人翟氏施舍经巾功德疏》或者《天福十三年浚阳郡夫人翟氏造五色锦绣经巾施入宕泉窟疏》。似乎施舍时要举办一种仪式,由高僧宣读,前揭《国清百录》卷 2 仁寿元年皇太子杨广所送天台山贡品到达,天台山僧人要宣读施物,并向杨广感谢,《谢启》全文是:“天台寺故智者弟子沙门智越一众启。使人兼通事舍人张干威至。谨领前件物等,并皆完净。仍即陈罗先师舍利龕前,具宣来令并唱施物。又千僧法斋。伏惟弘护殷勤,慈泽周至。香炉微妙,天匠庄严。洪钟和雅,震集凡圣。胜旛舒旆,疑悬梵宫。酥酹盐桃,请同香积。法衣净饰,无着离尘。毡物丰多,惊眩视听。千僧云集,布满山庭。爰降王人,光显林谷。奉对灵龕,必神通摄受。标拟众圣,冀愿海庄严。越等凡微,谬当恩沐。慈润重沓,难可克胜。合众虔虔,如履冰刃。不任戴荷之至,谨启谢闻。谨启。仁寿二年正月六日。”从“谨领前件物等……并唱施物”一句看,本文所讨论的《施舍功德疏》当是“唱施物”(宣读施舍的物品名称)之文本。

我们之所以不称《发愿文》,是因为《施舍疏》与《发愿文》之间存在一些区别,《施舍疏》是对寺院的施舍供养之疏文,多数与自身疾病、灾难无关,是一种相对纯粹的功德,《发愿文》则是为了自身需求之祈愿文,虽然也有施舍,但属于“临时抱佛脚”,有较强的功利性。如 S. 4536《施经巾发愿文》云:“厥今开像阁,严真场,常隆十善之因,每叶庄严之念。炉焚百宝,供备七珍,罄舍资财,故造经巾供养。亦使灰魂被佑,颇超三有之身,殄障消灭,广竖良缘者矣。时则有持炉公,奉为故小娘子小祥追念之福会也。惟小娘

《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中华书局,1962 年,第 104 页。《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中华书局,2000 年,第 82—83 页。

子乃云云至孝等。自惟情同地陷,意重天崩,恒怀结发之恩深,乃念劬劳之德厚。无处控告,惟福是凭。荐拔幽灵,经巾转念。其经巾乃绦罗间错,锦绣分晖。天仙对对而翔空,宝女双双而化出。文殊菩萨,超十地以初来;普贤真身,等鹫峰之圣会。是以一敷则千花蔽日,一献则万佛云臻。承斯罪灭福生,永拔淤泥之径。是时也,爽气澄秋,高风戒节。故得金经罢启,玉轴还终。延百福则造此经巾,殄千殃则设斋转念。”这件文书对经巾有具体的描述,值得关注。

或曰 S. 2687(1)功德主是曹元忠夫妇^[2],但写本中有“府主宠禄,膺五岳而长隆;寿比王乔,等五星而永曜”句,既然是对府主(曹元忠)的祝愿,当非府主本人口吻。“己躬康吉,贤圣护持”中的“己躬”才是真正的功德主。笔者认为这条经巾可能不是曹元忠夫妇联合布施、而是曹元忠夫人翟氏单独布施,《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定名无误。

笔者所知独立的《施舍经巾疏》只有上述2件,而一次施舍多种供养物品的《施舍功德疏》中的物品中也有经巾,如 S. 5663 为《中论》卷2—5,卷2后面有五代道真尾题:“乙未年(935)正月十五日,三界寺修《大般若经》兼内道场课念沙门道真,兼条修诸经十一部,兼写《报恩经》一部,兼写《大佛名经》一部。道真发心造大般若帙六十个,并是锦绉绵绫俱全,造银番(幡)伍拾口,并施入三界寺。铜令(铃)香卢(炉)壹、香椽(按:此字笔者不识,从与香炉并列看,应是香炉的附属器物,大约是香匙之类的香供养具,或许是“榿”字,即处理香炉内香料的棍棒)壹,施入三界寺。道真造刘萨诃和尚,施入番(幡)二七口,铜令(铃)香卢(炉)壹、香椽、花毡壹。已上施入和尚,永为供养。道真修《大般若》壹部,修诸经十三部,番(幡)二七口,铜令(铃)香卢(炉)壹,香椽壹,经案壹,经藏壹口(按:此“经藏”不知何物,这里可能是指藏纳佛经用的布袋,用于借阅、外出讲经等携带佛经用),经巾一条,花毡壹。以上施入经藏供养。”大约这次功德包括施三界寺、施某和尚、施经藏三处,分别属于佛、僧、法三宝供养。

S. 3565(2)《曹元忠夫妇等人布施疏》:“弟子敕河西归义等军节度使检校太保曹元忠与浔阳郡夫人及姑姨、姐妹、娘子等造供养具疏,造五色锦绣经巾壹条、杂彩幡额壹条、银泥幡,施入法门寺,永充供养。右件功德,今并圆就,请怀念。赐紫沙门□(按:此字为法门寺赐紫沙门的名字,字迹清楚,但笔者不能释读)。”其中杂彩幡额应该是类似垂幔

之类的供养物品,如供养垂幔。东京国立博物馆1952年收藏一件敦煌出垂幔,高76cm,宽242cm,上为绢幅,下垂若干绢条(类似现代的领带)。图见东京国立博物馆1992年编《创立百二十年纪念:日本と东洋の美》第249图。银泥幡则存有多件,如法藏EQ 1418,高195.0cm,宽56.8cm,银粉线绘双手合十菩萨立像一身,榜题:“南无救苦观世音菩萨。”

上述资料能否解决前揭《敦煌学大辞典》“经巾”条所云“其形制与用途不明”之问题呢?经巾的尺寸、形制在敦煌文献中有记载,故可考得一二。

二 经巾不是经帙

蕃占期间文书 P. 3432《吐蕃统治时期龙兴寺器物点检历》(下称《龙兴寺器物历》)有92行,首全尾缺,卷长201cm,现存部分可以分三部分,第一部分,第1—16行,佛教造像(金铜像、绣像等),标题:“龙兴寺脚趺石老脚下依蕃籍所附佛像、供养……等,数如后”。第二部分,第16—56行,佛经,标题“经,目录如后”。第三部分,第57—92行(后缺),寺院财物等,标题“佛衣及头冠,数如后”。法国学者侯锦郎《敦煌龙兴寺的器物历》对这份《器物历》有过详细研究,但他将经帙与经巾完全等同:“我们这份器物历上描述的4块经巾(第53、54、56和57号)均为长方形(可能有一块例外,它为矩形),可以计到从一箭半到三箭和一指等长度。前3种为各种丝绸,如锦、花罗和绢,它们都有彩色丝绸里子。最后一种为布,没有里子,相反却用一幅手工画来装饰。写在佛经之后的一种说明使我们可以估计当时每种经巾的平均面积:‘已前,都计三千一十(百?)八十卷,经帙二百八十八个’。这样一来,我们就知道了每块经巾都包有11卷经文。”他将288个经帙加上4块经巾,认为是“292种经巾”^[3]。但这份《器物历》是将经巾与经帙单独叙述的,说明它们是有区别的。

另一个重要特征是,经巾的尺寸大小不一,大的有“长叁箭壹,横阔两箭半”,小的有“长壹箭半,阔叁尺伍”,就长度而言,差一倍之多。经帙用来包

图见赵丰主编《敦煌丝绸艺术全集·法藏卷》第37图,东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按:此书将第36图与37图排错,第36图的标题、图版说明为此件银泥幡。

“一箭”等于五尺,参拙稿《吐蕃长度单位“箭”考》,《藏学学刊》第7辑,即刊。

裹佛经,一条经帙包裹约 11 卷佛经,P.3432《器物历》记载佛经 3180 卷,用了 288 个经帙,平均 11 卷为一帙。因为经帙是包裹佛经用的,所以大小基本统一,尺寸相差不大。由于佛经高度一般在 25—30cm 间,所以经帙的高度(宽)不会超过 35cm,这是判断经帙的一个原则。赵丰主编《敦煌丝绸艺术全集·法藏卷》第二部分图录第 74—81 号、第 98—99 号为经帙(见表),多数高度是 27—30cm,相当统一(由于残破,宽度差异较大,大约完整的宽度是 60cm 左右)^[4]。准此,英藏 L. S. 486(Ch. 0078)麻布框宽 56.5cm,高 30.3cm,可视为经帙的标准尺寸。值得注意的是,表中的 2 件麻布经帙正好是 56cm,与此不同,法藏 MG 26789 绢框(主体内容缺失)宽 84.0cm,高 63.5cm,则有可能不是经帙,较可能是经巾。

从 P.3432《龙兴寺器物历》将经帙与经巾分别叙述、记载的尺寸看,经巾不是经帙。

表:《敦煌丝绸艺术全集·法藏卷》经帙尺寸(单位:cm)

“法藏卷”号	馆藏号	名称	高	宽
74	EQ 1200	“大智论第一帙”经帙	27.1	32.8
75	EQ 1208	花卉纹绞编经帙	29.0	44.0
76	EQ 1209/1	“摩诃般若经第一帙”经帙(锦缘花卉纹绞编经帙)	27.8	36.1
77	P. 4509	绞编经帙(背面《尚书》)	30.0	21.3
78	EQ 1199	团窠尖瓣对狮纹锦缘经帙	30.0	66.5
79	EQ 1207	联珠对兽纹锦缘经帙(开元寺)	28.0	54.5
80	EQ 3663	花卉纹锦缘经帙	32.5	51.5
81	EQ 3660	浅棕色点花绦经帙	27.5	64.8
98	P. 6002(2)	麻布经帙	35.5	56.0
99	P. 3878A	麻布经帙	33.0	56.0

三 经巾是经案上的铺垫物

前揭 S.4536《施经巾发愿文》提到:“其经巾乃绦罗间错,锦绣分晖。天仙对对而翔空,宝女双双而化出。文殊菩萨,超十地以初来;普贤真身,等鹫峰之圣会。是以一敷则千花蔽日,一献则万佛云臻。承斯罪灭福生,永拔淤泥之径。是时也,爽气澄秋,高风戒节。故得金经罢启,玉轴还终。延百福则造此经

巾,殄千殃则设斋转念。”其中“金经罢启,玉轴还终”就是佛经看罢,经轴将佛经重新收藏,又形容敷设经巾:“一敷则千花蔽日,一献则万佛云臻。”于此推测,经巾是阅读佛经时,为保护、尊重佛经而铺在经案上的布或绢。《全唐文》卷 676 白居易《香山寺新修藏经堂记》记载开成五年(840)新建的藏经堂中,“榻、席、巾、几,泊供养之器咸具焉。”其中的“巾”就是经巾,从内容看应该就是铺设在经案上的布或绢,便于信徒在藏经堂阅读藏经。

四 经巾的结构与图案

经巾包括外、内层,“花罗表,红绢里”。经巾上面还绣有图案、图像,简单一点的是一些织出的图案、千佛,如 S.1624V《天福七年(942)大乘寺器物历》首尾缺,第 9 行记载有“千佛经巾壹。”按:该《器物历》与 S.1774、S.1776 基本相同,当为底本与抄本的关系。有的经巾则绣出复杂的飞天、文殊、普贤等尊像,S.4536《施经巾发愿文》云:“其经巾乃绦罗间错,锦绣分晖。天仙对对而翔空,宝女双双而化出。文殊菩萨,超十地以初来;普贤真身,等鹫峰之圣会。是以一敷则千花蔽日,一献则万佛云臻。”

五 经巾的尺寸

P.3432《龙兴寺器物历》第 78—81 行记载的 4 块经巾是:“故高离(当即高丽)锦经巾壹,色绢里,四方各长壹箭半。又细画布经巾壹,长叁箭壹,横阔两箭半。木经案,大小共贰。绀绢经巾,色绢里,白练画像,长两箭,阔壹箭半,不堪受用。又,经巾壹,花罗表,红绢里,长壹箭半,阔叁尺伍,不堪用。”上述 4 件经巾相当于侯锦郎文中 53、54、56、57 号(第 55 号属于经案,也佐证经巾是铺设在经案上的物品)。从尺寸上可以看出,第 53 号高丽经巾为正方形,四边均为一箭半。第 54 号细画布经巾为长方形,长三箭一、宽二箭半。第 56 号绀绢经巾长二箭、宽一箭半。P.2613《咸通十四年(873)龙兴寺器物历》记载:“(第 8—9 行)故破碎高离(当即高丽)锦经巾壹,麝尘绢里,每面各长壹箭

图见赵丰主编《敦煌丝绸艺术全集·英藏卷》第 54 图,东华大学出版社,2007 年。
图见赵丰主编《敦煌丝绸艺术全集·法藏卷》第 72 图,东华大学出版社,2010 年。

半……(第 11 行)故破黄綾铜经巾壹,长叁箭,不堪受用……(第 31—32 行)故破错彩经巾壹,紫绢绀里。故破花罗经巾壹,不堪用……(第 64 行)独织锦经巾壹拾捌个……(第 83—84 行)绀绢夹经巾肆,每面各长壹箭、阔肆尺。”按:此《咸通十四年龙兴寺器物历》部分物品在此前(蕃占期间)文书 P. 3432《龙兴寺器物历》中可以见到,两者存在关联。

六 经巾的特殊性

前揭 S. 2687(1)、S. 2687(2)、S. 5663、S. 3565(2)等施舍发愿文中,每次布施经巾都只有一条,说明经巾在某种场合使用并且只有一条,于是我们推测经巾应该就是在法会上念经时铺设在经案上的布或绢,因为举办法会时只要一条经巾就够了,而其他物品如幡、经帙等可以随意施舍。再举一例 S. 2575 正反面抄有 11 通寺院文书, S. 2575 (1)《天成三年(928)七月十二日都僧统海晏于诸寺征集幡、伞、经巾帖》:“(前约缺一行)有常例,七月十五日应官巡寺,必须并借幢、伞,庄严道场。金光明寺:故小娘子新见要伞拾副。龙兴:叁副、官绣伞叁副。普:伞壹副、幡伍拾口、经巾壹条、额壹条。安国:大银幡贰拾口、经巾壹条、额两片。开元寺:大银幡陆拾口。灵修:绣幡捌口。乾、净土:各额壹条(按:下空一行,似乎是另一次道场的用品)。大云寺:要伞叁副。开:壹副。国:壹副。乘:额一条、幡叁拾口。灵修:银幡贰拾口、经巾壹条、额壹条、伞壹副。大:绣像二。(按:此后被另一张文书《天复五年八月灵图寺徒众请大行充寺主状及都僧统判文》覆盖,然后仍是此文书《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编为《为筹办七月十五日庄严道场启》、《天福五年(940)捌月灵图寺徒众请大行充寺主牒》、《天成三年都僧统海晏征求庄严道场什物帖》等 3 件文书)……灵图寺:要伞两副。普:两副。奉唐寺:幡贰拾口。安国寺:幡贰拾口、额壹条、经巾壹条。普:青裙额一条。灵修、莲、安国:官幡各七口。三界寺:要伞。灵修:伞壹副。大乘:壹副。乘:额壹条、经巾壹条。莲、净土:各幡贰柒口。开、大:像贰。大:额壹条。国:经巾壹副。右上件所配幡、伞,便须准此支付,不得妄有交互者。天成三年七月十二日帖。应管内外都僧统海晏。”即七月十五日(安居结束日)为接待例行巡检寺院的官员而举办一次道场,都僧统征集各寺供养具,涉及金光明寺、龙兴寺、普光寺、安国寺、开元寺、灵修寺、乾元寺、净土寺、大云寺、大乘寺、灵图寺、奉唐

寺、莲台寺、三界寺,敦煌主要寺院都参与了这一活动。本件文书显示,一些寺院出经巾,但一寺只出一条,可见经巾是寺院的特殊物品,数量不多。

有关经巾的敦煌文献还有:S. 1776V《显德五年(958)大乘寺器物历》首尾完整(尾缺约一行),第 12—16 行记载该寺有:“司马锦经巾壹,在柜……黄布经巾壹、又黄布经巾壹……百衲经巾壹。”按:S. 1776《天福七年器物历》(S. 1774、S. 1624 同)记载:“司马锦经巾,在柜……黄布经巾壹条……千佛经巾壹。”P. 3161《永安寺器物历》第一行记载该寺有“杂色锦绣经巾壹”。S. 2607V《某寺器物历》首尾均缺,第 11—13 行记载该寺有新旧经巾 4 件:“织成锦经巾壹,白绵里。古破绣经巾壹,无里。新锦绣大经巾壹,红川(?)锦缘,红□里。古破青缣经巾壹,欠里,壹副。”P. 3587V《某寺器物历》首尾均缺,第 15—21 行也记载有经巾:“银泥经巾子一……画布经巾贰……谏导经巾,长柒尺。”此处的“谏导经巾”不知为何有此名。郝春文《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一书对 29 份寺院《器物历》进行了详细统计,其中包括经巾,可参考^[5]。

于此可见,经巾不是一般的施舍物,而是寺院在法会上使用的庄严之供养具(也许僧人读经时也使用),因此施舍经巾是古代一种重要的佛教供养方式。《宋高僧传》卷 8“慧能传”记载武则天曾送慧能经巾等物:“遂赐摩纳袈裟一缘、钵一口、编珠、织成经巾、绿质红晕花绵巾、绢五百匹充供养。”其中编珠当为念珠,“绿质红晕花绵巾”可能是绵质经巾。P. 2613《咸通十四年器物历》记载的龙兴寺器物中经巾较多(26 件),其中独织锦经巾就有 18 件。敦煌龙兴寺所藏的经巾较多、较贵重(如有高丽产),因为该寺是敦煌一所大寺,《唐会要》卷 40 记载神龙元年(705)二月,即复唐当月,诏诸州置寺、观各一所,全国统一称中兴寺、中兴观,三年(707)改名龙兴寺、龙兴观。敦煌的龙兴寺僧徒较多,还办有寺学,属于敦煌的一所大寺,一直到宋代还见记载(《天禧塔记》,1019 年)。S. 381《辛巳年(801)龙兴寺毗沙门天王灵验记》记载龙兴寺在节日有娱乐活动:“大番岁次辛巳闰二月十五日,因寒食,在城官僚百姓就龙兴寺设乐。寺卿张闰之家人圆满,至其日暮间至寺,看设乐,遂见天王头上一鸽,把一小石打鸽不着,误打神额上……”大约龙兴寺是当时敦煌重要佛教活动场所,经巾也就比较多。尺寸大的经巾可能在重大法会上铺垫在讲席经案上,而尺寸小的经巾则可能是

僧人日常读经时铺垫在经案上,如 P. 2613《咸通十四年器物历》第 83—84 行记载的经巾(“緋绢夹经巾肆,每面各长壹箭、阔肆尺”)就较小。

七 经巾实物

根据上述经巾的特征,我们是否可以由敦煌出土丝织品中发现经巾呢?英藏敦煌丝织品中,MS. 856 (Ch. 1v. 0028) 最有可能是经巾。MS. 856 长 149cm,宽 107cm,中间是多块绢片拼接,大小不一,但对称分布,四周有完整的边(图版 1),原定名“袈裟”,现在看来可能就是所谓“错彩经巾”、“花罗经巾”、“緋绢夹经巾”之类的经巾。2007 年东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赵丰主编《敦煌丝绸艺术全集·英藏卷》第 79 图为一经巾,图版说明将年代定为中唐—晚唐,长 150.5cm,宽 111.0cm,该书认为:“经巾是一块方形或长方形的用以包裹经卷的包袱布。”MS. 856“由各种面料拼缝而成,包括绢、暗花绫、暗花绮、锦、夹缬绢、绢地刺绣等,在制作时按一定的对称规律拼贴。斯坦因曾认为这件织物是愿用的奉献品,也有人认为它是袈裟,但根据它的尺寸及形制看,更应为‘百衲经巾’。”(第 91 页)该书第 80 图(L. S. 343, Ch. 0075)红菱纹罗地刺绣也可能是一块经巾,有边,残长 97cm,宽 59cm。俄藏、法藏敦煌丝织品中还有一些长方形的带边的织物,一般称谓“供养帐”,如法藏 EQ 1174“手绘对狮对凤纹麻布”,高 76.5cm,宽 92.5cm,四周有边,下方中央绘香炉并二香宝子,两侧各一蹲狮,上方绘衔枝对凤。俄藏敦煌丝织品中,Дх. 74 号为麻布画,长 127cm,宽 96cm,四周有边,中央为带香宝子的供养香炉,两侧各二身凫雁。这类图像常见于佛说法图的下方(如第 220 窟南壁西方净土变中央主尊下方的香炉),由于有瑞兽、瑞禽、供养香炉等佛教供养图像,就不可能是坐垫、日常桌布之类,而是供养物品,经巾的可能性最大,但仍需斟酌。

日本正仓院藏有几十件“锦几褥”,其中南仓藏的一件“几褥”长 42.5cm,宽 34.0cm,中央为一块织锦,四周有边饰,与英藏 MS. 856 百衲经巾类似,这类“几褥”保存在寺院中,至少有一部分是当经巾用的吧。

八 关于 S.2687 与莫高窟第 61 窟、55 窟的关系

《敦煌研究》2010 年第 3 期发表陈菊霞《S. 2687

写本与莫高窟第 61 窟、55 窟的关系》,作者的结论是:“通过上述讨论,笔者认为 S. 2687 写本是节度使曹元忠与浔阳翟氏夫人在莫高窟营建洞窟的毕功疏文。细而言之, S. 2687(1)写本是曹元忠夫妇功德窟第 61 窟的毕功疏文, S. 2687(2)写本是曹元忠夫妇功德窟第 55 窟的毕功疏文。”但我们认为 S. 2687(1)、S. 2687(2)含义明确,就是《施舍经巾功德疏》,绝不是《建窟毕功疏》,这个问题似乎无需讨论。陈菊霞论文启发我们作另一种推测:一、曹元忠在 61 窟、55 窟建成之际,举办过一次法会,法会上宣读的《建窟毕功疏》没有流传下来。二、举办法会可能还包括念经活动,为配合念经,浔阳翟氏为法会分别施舍了一条经巾, S. 2687(1)、S. 2687(2)就是她的《施舍经巾功德疏》。由于经巾是比较特殊的供养具,所以这 2 件《施舍经巾功德疏》与 61 窟、55 窟的完工也许确实存在关联,这是笔者对“经巾”考察后的一点认识。

参考文献:

- [1] 敦煌愿文集[M]. 黄征, 吴伟, 编校. 长沙: 岳麓书社, 1995: 376-378.
- [2] 陈菊霞. S. 2687 写本与莫高窟第 61 窟、55 窟的关系[J]. 敦煌研究, 2010(3).
- [3] 法国学者敦煌学论文选萃[M]. 耿升, 译. 北京: 中华书局, 1993: 88, 83.
- [4] 赵丰, 主编. 敦煌丝绸艺术全集·法藏卷[M]. 上海: 东华大学出版社, 2010: 126-142, 159.
- [5] 郝春文. 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138.

图见 The Art of Central Asia: The Stein Collection in the British Museum (3), Tokyo: Kodansha Ltd. 1985, Pl. 9.

图见赵丰主编《敦煌丝绸艺术全集·法藏卷》第 144 图, 东华大学出版社, 2010 年, 图版说明称“其用途尚不明确”, 第 210 页。同书所收法国学者劳合·费日《吉美博物馆藏敦煌纺织品概述》一文认为是“供养桌布”, 第 21 页。

图见俄罗斯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罗斯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藏敦煌艺术品》(1),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年, 第 92 图。

图见奈良国立博物馆编《昭和六十一年(1986 年)正仓院展》第 25 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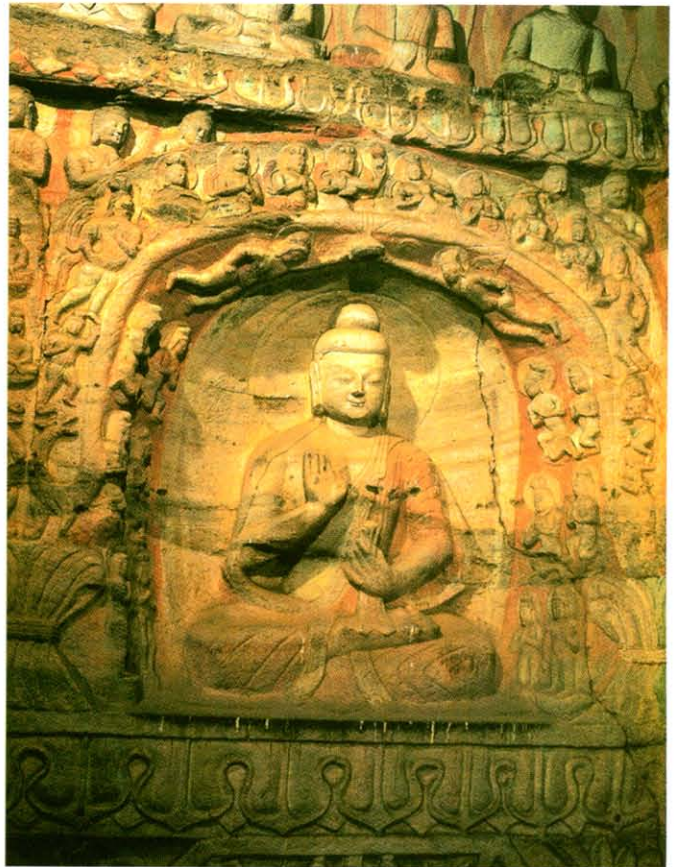
图版1 英藏MAS.856 百衲经巾



图版2 释迦三尊像 (正面)
河北成安县出土 北魏太和六年(482)



图版3 释迦三尊像 (背面)
河北成安县出土 北魏太和六年(482)



图版4 坐佛 云冈石窟第7窟 东壁